

# 咸丰、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群体综论

陈 水 云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陈水云(1964-), 男, 湖北武穴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词学、明清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摘 要] 淮海词人群是一支在咸丰、同治年间活跃于扬州地区的词人群体。它的主体成员由仕宦、流寓、本籍三部分组成, 以蒋春霖、杜文澜、 沆和为其代表, 他们在扬州地区结词社, 组织诗词唱和, 编印同仁词选或词集, 创作上注重词律的研讨, 内容上以凄怨幽咽为美。

[关键词] 咸丰; 同治; 扬州; 词人群体; 研讨声律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6-0824-07

在周济(1781—1839)、戈载(1786—1856)之后, 江南词坛已形成新的发展格局, 浙、常两派对话语权的“焦虑”和“争夺”在弱化, 地域性文学群体的包容性似乎表现得更为充分和明显, 常州、吴中、嘉兴、杭州等地都有这样的词人群体在活动, 江北的扬州地区也活跃着一支以蒋春霖、丁至和、杜文澜为代表的淮海词人群体。这是一支以外来流寓或仕宦扬州的词人为主体的文学群体, 其活动时间大约在咸丰、同治前后的20年间, 活动范围为扬州府的两州(泰州、高邮)六县(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 一个南濒长江、北接淮河、东至海隅、运河为其主要交通纽带的地区。关于这一群体的杰出人物——蒋春霖, 过去关注较多, 对这一词人群体却是缺乏必要的了解, 然而文学史研究的任务不只是对一些名家思想、行为、成就的述评, 更是对这一人物活动的时间(历史背景)、空间(地域环境)和生态(人际交往)的历史还原, 本文正是要对淮海词人群的人员构成、文学活动、整体风貌、词史地位进行历史性的还复。

## 一、一个新的词人群体

关于“淮海词人群”这一提法, 首见宗湘文《水云楼词续序》, 序云:“同治壬戌(1862)以后, 予居泰州数年, 兵戈方盛, 人士流离, 渡江而来, 率多才杰。一时往还如王雨岚、杨柳门、姚西农、黄琴川、钱揆初、黄子湘, 皆以诗名, 而蒋鹿潭之词尤著。”<sup>[1]</sup>(第211页)而后, 冯煦《蕙月词序》亦说:“咸、同之交, 淮海间多词人。若江阴蒋春霖鹿潭、江都丁至和葆庵、甘泉李肇增冰叔、郭夔尧卿, 并为倚声家泰斗。”<sup>[2]</sup>(第128页)20世纪80年代, 冯其庸先生曾辑有《淮海词话》, “以尽收咸、同间淮海词人之遗闻逸事乃至对各家之评鹭”<sup>[1]</sup>(第315页)。很显然, 在他们看来, 咸、同年间的确实存在着一支以蒋春霖为盟主的淮海词人群体, 到90年代严迪昌先生辑《近代词钞》更明确地提出“淮海词人群”的概念<sup>[3]</sup>(第763页)。

对于这一词人群体活动记录较多的有杜文澜编《憩园词话》和李肇增选《淮海秋筵集》, 再结合近人冯其庸先生所辑《淮海词话》, 可知这一词人群体大体上是由三类人群组成的——本籍、流寓、仕宦, 其中仕宦和流寓者为主体。属于仕宦者有: 乔松年(有《萝摩亭词》)、金安清(有《偶园词钞》)、杜文澜(有《采香词》)、方浚颐(有《古香凹诗余》)、宗元瀚(有《颐情馆词钞》)、钱勛(有《双影庵词》)、马书城(性喜填词,

无专集);属于流寓者有:蒋春霖(有《水云楼词》)、周作熔(有《潇碧词》,一名《蕢月词》)、周腾虎(有《蕉心词》)、黄之驂(有《宋人词说》)、周闲(有《范湖草堂词》)、周学濬、王荫昌(有《尺壶词》)、黄文涵、姚辉第(《菊寿庵词》)、赵熙文、高望曾(有《茶梦庵烬余词》)、褚荣槐(有《烟花小劫词》)、张熙(有《江南好词》、《平陵主客词》)、姚正镛(有《江上维舟词》)、黄涇祥(有《豆蔻词》)、赵彦俞(有《瘦鹤轩词》);属于本籍者有:王敬之(有《三十六陂渔唱删存》、《三十六陂渔唱乙稿》)、丁至和(有《萍绿词》,一名《十三楼吹笛谱》)、丁至德、张安保(有《晚翠轩词》)、范凌雙(有《冷灰词》)、吴熙载(有《匏瓜室词》)、汪鋈(有《梅边吹笛词》、《梅边吹笛词续存》)、李肇增(有《冰持庵词》)、王莼(有《受辛词》)、张丙炎(有《冰瓯馆词钞》)、郭夔(有《印山堂词》)、马汝楫(有《云笈词》)、黄锡禧(有《栖云山馆词》、《栖云山馆词存》)、陈宝(有《狂奴词》)。据黄嫣梨统计,蒋春霖交往的朋友达50人之多,上述词人显然不是淮海词人群体的全部。如果作详细的统计,预计这一群体的成员应该在百人以上,但上述所列成员则无疑是淮海词人群体的主体。

这一词人群体,是因扬州之故而聚集在一起的。扬州的文化繁荣有赖于盐业的昌盛和发达,这些词人或多或少都和盐业发生一定的关系,或是依附盐商,或是出任盐官,或是充任幕僚。如金安清由泰州同知擢海安同判,历升至湖南督粮道,同治元年晋两淮盐运使,组织“军中九秋词社”。杜文澜在咸丰年间,曾权泰州分司,任淮北临掣,调海州分司运判,改通州分司运判,后任两淮盐运署淮南总局帮办,前后在扬州、泰州任职十年之久。蒋春霖自道光末为淮南盐官,转为富安场大使,后因丁母忧而去官,一直流寓在东台、泰州、扬州等地,依附盐官金安清、乔松年、杜文澜等。丁至和初幕游大江南北,60岁后归住邗江,时两淮盐运使方澐颐续修《扬州府志》,他被聘为分纂。周熔自幼时随父业鹺,至伍祐,遂家焉。褚荣槐在咸丰丁戊(1857—1858),游淮海间,辛酉(1861)客伍祐,依场大使王如金醉墨幕,后选授为龙游教谕。等等。正如杜文澜所说,“两淮鹺政,聚于扬州,需次盐官,多至数百”,这些盐官中有不少是“颇耽风雅而工长短句者”,“词人依附者亦不少,故词亦盛于扬州”<sup>[4]</sup>(第2939页)。

对于词人群体的考察,除了成员构成的因素外,群体的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把不同社会层次和审美趣味的人聚集在一起,不但为其成员提供了交流和切磋的机会,而且还加深了这一群体的凝聚力,提高了群体成员的表达技巧。淮海词人群体之间多有交际性往来,还开展过不同形式的唱和活动,这些活动的地点主要在扬州、泰州、东台三地,还编选有同人词选(李肇增编《淮海秋筵集》),或翻印同人词集(杜文澜翻刻有蒋春霖《水云楼词》和丁至和《萍绿词》),这些是他们作为一个词人群体存在的标志。因为过去关于这一词人群体的活动记载太少,兹据杜文澜《憩园词话》、严迪昌《近代词钞》、周梦庄《蒋鹿潭年谱》、朱德慈《杜文澜行年考》等大致勾勒如下:

道光二十八年(1848)春,蒋春霖至扬州,谋任两淮盐官,这是淮海词人群体汇聚扬州的开始。

咸丰元年(1851)杜文澜、蒋春霖订交。时,杜权泰州分司,蒋为富安场大使。这标志着淮海词人群的正式形成。

咸丰三年(1853)秋,两淮盐运使移署泰州。金安清从金陵围城出,述沙洲避雨光景,蒋春霖为赋《台城路》。“时画角咽秋,灯焰惨绿,如有鬼声在纸上。”范凌雙、吴熙载等有七夕之会,各赋《迈陂塘》一阕。

咸丰四年(1854)元日,赵熙文访蒋春霖于富安场,蒋赋《甘州》一阕;二、三月,蒋春霖送周腾虎、赵熙文至杭州,赋《齐天乐》一阕;春,杜文澜、张熙在扬州军府辞别,各赋《长亭怨慢》一阕。冬,杜文澜、蒋春霖再晤于扬州,话黄鹤楼旧游事,杜赋《忆旧游》一阕记之。

咸丰七年(1857)乔松年任两淮盐运使。褚荣槐自此年始客游淮海。徐鼐与蒋春霖、周腾虎订交,并为蒋春霖《水云楼词》作序。九月九,姚正镛、汪鋈、黄子鸿、张安保等为登高之会,各赋《龙山会》一阕。

咸丰九年(1859)春、夏,蒋春霖、褚荣槐、金安清两度相聚于东台。是年起,蒋春霖移居泰州,寻求任职,一直未能起复,从此开始困处泰州八年的生活。

咸丰十年(1860)三月,丁至和请人绘《十三楼吹笛图》,自赋《瑶华》,遍征题咏,杜文澜赋《瑶华》、马书城赋《月下笛》、周作熔赋《声声慢》、张熙赋《解连环》;夏,杜文澜、李肇增、郭夔诸友相聚于泰州,杜文澜赋《万年欢》一阕。李肇增编《淮海秋筵集》十二种由栖云山馆刊印,作者为张安保、范凌雙、吴熙载、汪

鏊、李肇增、王炎、张丙炎、黄涇祥、郭夔、马汝楫、姚正镛。这是以本籍词人为主体的一次重要集结。

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蒋春霖、郭夔游扬州慈慧寺,仿姜白石而赋《角招》;上巳,丁至和等休楔于莲溪,杜文澜因事未赴;杜文澜、黄文涵再聚于泰州,杜作《好事近》记之;杜文澜编刻《曼陀罗华阁丛书》七种,为吴文英《梦窗词四稿》、周密《草窗词稿》、及自编《古谣谚》、自作《采香词》、《词律校勘记》等,同时刻印蒋春霖《水云楼词稿》、丁至和《萍绿词》,这是淮海词人“三大家”创作和思想的集体展示。

同治元年(1862)春,杜文澜、宗源瀚订交;杜文澜、宗源瀚、丁至和同题《江天晓角图》。秋,两淮盐运都转金安清在泰州组织“军中九秋词社”,以军中生活为题:秋筠、秋栢、秋堠、秋灶、秋镒、秋幢、秋暮、秋角、秋堞,参与社事者为金安清、杜文澜、蒋春霖、宗源瀚、钱勛、黄文涵、张熙、黄涇洋、姚辉第九人。不久金安清被革职,这是淮海词人群体活动的顶峰,也是淮海词人唱和活动由盛转衰的标志。

同治三年(1864),杜文澜奉调至安庆,从此改任他职,结束了他在扬州、泰州、东台的唱和活动。

同治四年(1865),金眉生还居扬州,赋诗索和,蒋春霖赋《扬州慢》;蒋春霖送宗源瀚入都,赋《角招》;蒋春霖为杜文澜题《忆旧游·杜小舫从军纪旧图》。

同治七年(1868)蒋春霖卒,淮海词人群体活动亦逐渐风流云散。

通过以上描述,大约知道淮海词人群体的活动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各地词人汇聚扬州,蒋春霖、杜文澜先后到淮海地区任职是其标志。第二阶段,自咸丰十年,蒋春霖移居泰州,这是淮海词人群体活动最兴盛的时期。第三阶段,同治七年,蒋春霖去世后,其他淮海词人还在活动,但已失去往日的繁华,诗词唱和活动亦趋消歇。

如上所云,淮海词人群体成员有百余人,主体亦有40余人,然词坛柱石则非蒋春霖、杜文澜、丁至和三家莫属,这三家代表着盐官、流寓、本籍三类人群。金吴澜为重刻本《校注宋七家词选》撰序说:“咸丰丁巳(1857), (杜文澜)方伯与蒋鹿潭、丁葆庵明经往来,两君皆精词学,不免故技渐痒,相与讨论。其时,方伯偶一为之,亦未善矣,岂知方伯专心讲求数月,而为鹿潭、葆庵所钦佩。”已说明三家在淮海词人群中的重要地位,近人周曾锦也认为蒋鹿潭、杜文澜二位在清词史上地位极为重要。“天挺二老于咸同之际,亦词界之中兴也。”<sup>[5]</sup> (第464页)但是,他忽略了丁至和在淮海词人群中的重要性,谭献说过“萍绿与水云齐名”<sup>[6]</sup> (第255页),严迪昌先生也认为“咸丰之际,淮扬、东台一隅,集合之词群活动为近代词史重要关目,丁至和与蒋春霖齐名当时,联同杜文澜等倚声酬应,构成中坚”<sup>[3]</sup> (第763页)。

## 二、一个注重研讨声律的词人群体

扬州,曾是南宋大词人姜夔游历过的地方,他在这里留下了千古绝唱——《扬州慢》,也为扬州词坛留下了研讨声律的风尚和传统。雍正、乾隆时期,以厉鹗为首的邗江吟社,便是一个推重姜夔、讲求声律之美的词人群体。在嘉庆、道光时期扬州也有一群词人在活动着,他们是流寓扬州的凌廷堪和籍属扬州的焦循、江藩、秦敦夫等,这些词人也是乾、嘉时期清代三大学术流派之一——“扬州学派”的重要成员,他们的创作在总体上体现了一种学人之词特征——填词严守声律,这正是扬州词坛的地域风尚。

众所周知,凌廷堪祖籍虽为安徽歙县,出生地却在海州板浦场。他自言少时以填词自娱,尤为服膺精于音律的南宋词人姜夔,故填词严守声律,并注明宫调。其弟子张其锦《梅边吹笛谱序》谓:“吾师之词,不主一家,而尤严于律。”江藩,扬州甘泉人,曾受业于吴县惠栋、余萧客、江声,博综群经,但亦善填词。顾广圻《扁舟载酒词跋》云:“子屏于词乃余事之余事,而《扁舟载酒》一卷,清真典雅,流离谐婉,追《花间》之魂,吸《绝妙》之髓,专门名家,未能或之先也。特是读者知其辞句之美易,知其字字入宫难。”秦恩复,字敦夫,扬州江都人。《续修扬州府志》卷九云:“(恩复)性喜填词,每拈一调,参考诸体,必求尽善,无一曼声懈字,著有《享帚词》三卷。”秦氏是扬州有名的藏书家,自称家有藏书二万余卷,曾校刻《乐府雅词》、《阳春白雪》、《词源》、《词林韵释》、《凤林书院草堂诗余》为“词学丛书”,其中《阳春白雪》是由他首先发现的,《词源》也是他据元钞本补足的全本。对于这部丛书的词学史中意义,顾千里《词学丛书序》是这样

评价的:“吾见是书之行也,填词者得之,循其名,思其义。于《词源》可以得七宫十二调声律一定之学,于《韵释》可以得清浊部类分合配隶之学,于《雅词》等可以博观体制,深寻旨趣,得自来传作,无一字一句任意轻下之学。继自今将复夫人而知有词即有学,无学且无词,而太史为功于词者非浅鲜也。”

上述数家,于词并非专诣,填词亦其余事,但他们对词律的熟谙和讲求,对咸、同时期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淮海词人群应该是有影响的,真正对淮海词人群词学思想发生直接影响的是王敬之和秦嶬。王敬之(1777—1856),字宽甫,扬州高邮人。有《词律》校本,曾与戈载拟为《词律订》、《词律补》。秦嶬(1792—1853),字玉笙,号绮园,扬州江都人。有《词系》20卷。王敬之词律之书虽未完成,但《词系》很幸运地被秦氏后人完整地保存下来。秦嶬在词律方面有着比较深厚的家学渊源,其父便是《词学丛书》的刊刻者秦恩复,在《词系·凡例》中秦嶬阐述了他编纂《词系》的动机及其对词律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明末清初的各家选本或词谱,“讲声调者不稽格律,纪故实者或略宫商”,只有万树的《词律》“纠讹驳谬,苦心孤诣,允为词学功臣”。但是,万树《词律》亦有罅漏,归结起来就是“四缺”(宫调不明,调下不载原题,专以汲古阁《六十家词》、《词综》为主,调名遗漏甚多)和“六失”(不论宫调,专以字数比较;所录之词,任意取择;调名原多歧出,务欲归并,而考据不详,颠倒时代;所据之本不精,字句讹谬,全凭臆度;前后段字数,必欲比同,甚至改换字句以牵合,缺失殊涉穿凿;《图谱》等书,原多可议,哓哓辩论,未免太烦<sup>[7]</sup>(第1-2页))。他编《词系》即是要对万氏《词律》作拾遗补缺、纠讹驳谬的工作,这也是便于后代的填词者能够严格地遵守唐宋词律。正所谓“倚声者,依其声而填之也;填词者,按谱而缀词也”<sup>[7]</sup>(第3页)。

杜文澜在多年创作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于咸丰十一年(1861)完成了《词律校勘记》二卷。在校勘记卷首之序文,他谈到自己的《词律校勘记》,便是在王敬之和秦嶬相关研究的基础进行的,还详细地阐述了他主张填词必须守律的思想,以及万树《词律》对于转变清初填词风气的重要意义:“元明以来,宫谱失传,作者腔每自度,音不求谐,于是词之体渐卑,词之学渐废,而词之律则更鲜有言之者;黄钟毁弃,瓦缶雷鸣,七百年古调元音,直欲与高筑嵇琴,同成绝响。使非万氏红友以《词律》一书起而振之,则后之人群奉《啸余》、《图谱》为准绳,日趋于错矩偃规,而不能自觉;又焉知词之有定律,律之必宜遵哉?”这一思想和秦嶬的观念可谓一脉相承,他不但提出填词必须守律的基本原则,而且将这一原则贯彻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他说:“余少好为词,服膺此帙,研究之际,旁及他书,偶有发明,笔之简首。岁月既久,所记遂多,编次上下二册,名曰《词律校勘记》。”在其晚年所撰《憩园词话》里,他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说明:“今之为词者,必依谱律所定字句,辨其平仄。更于平声中分为入声所代,上声所代;于仄声中分为宜上、宜去、宜入,音声允洽,始为完词。若谓既不能谱入管弦,何妨少有出入。藉宋、元、明人误声误韵,以自文其失律失谐,则且贻误后人,不如勿作。”<sup>[4]</sup>(第2852页)与其勿作,作则切不可有词律失谐之弊,正表明了杜文澜对词律之严格恪守的谨慎态度。

杜文澜在泰州时期填词渐多,是受到蒋春霖、丁至和的影响的。尽管现在无法找到具体材料说明蒋春霖、丁至和对词律问题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杜文澜编纂《词律校勘记》应该是征求过他们的意见的,他刊刻《词律校勘记》的同时,还刊刻了蒋氏《水云楼词》和丁氏《萍绿词》,当然也会将其他词籍如《词律校勘记》向蒋、丁二人作一番介绍,或者作一点大胆的推测,《词律校勘记》可能是杜文澜、蒋春霖、丁至和合作完成的作品。蒋春霖、丁至和填词慎守声律也是公认的客观事实。丁至和词集《萍绿词》又名《十三楼吹笛谱》,充分地说明他认识到填词必严守声律的特点。“其为词寝馈南宋,吸白石之神髓,而又得力于草窗,其佳处有玉田所不及者。协律极细,每拍一解,或十数日而后定,或十数月而后定,斤斤然蕲与古人相吻合,志亦专矣。”<sup>[4]</sup>(第2927页)蒋春霖虽未刻意求律之工,但填词往往能自然合律,达到人巧胜天工的效果。何咏《水云楼词序》云:“鹿潭所作,于九宫七始八十四调,不差累黍。而能天机开合,六情谐畅,别具工俚,自成馨逸。视夫胶柱聆音,引绳约尺,目论一孔,技穷三变者,不啻水观海而泥忆云矣!”<sup>[1]</sup>(第149页)同治四年(1865),鹿潭携黄婉君泛舟黄桥,“望见烟水,益念乡土,谱白石自度曲一章,以箜篌按之”,便是蒋春霖深谙词律的有力证明。周梦庄先生说,“鹿潭善品箫,每得新词,即命婉君倚声歌之,大有白石‘小红低唱我吹箫’之风韵。”<sup>[8]</sup>(第114页)

至于其他淮海词人,论词填词也都是比较注重声律的。何咏《水云楼词续序》曰:“夫倚声一道,厥工南渡。后有作者,等诸自郅。清词丽句,或嗤以声律无准。引商刻羽,则失之葩采不流。学者病焉,蒙有述矣。善乎休文之答韩卿!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韵顿舛,诚祛惑之丹沙、摘词之藻镜也。”<sup>[1]</sup>(第 149 页)这说明他们已认识到填词守律的重要性,他们如是说,亦如是作。如丁毓生:“词笔清圆,讲求律法,绝无叫嚣之习。”<sup>[4]</sup>(第 2929 页)张熙《法曲献仙音》(风荻秋收)起首二句,用入声处,考律极细,煞费苦心,气脉亦甚深厚。余石庄和丁至和《木兰花慢》、《齐天乐》二词,“刻意求工,镂金错采,多清脆之音。而于藏暗韵,用去上,均甚谐协”<sup>[4]</sup>(第 2931-2932 页)。周学濬不仅素工填词,而且辨律甚细,深谙词律之学,当他听说杜文澜意欲重刻戈载《宋七家词选》,特地致书杜文澜,指出:“顺卿好改宋词本字,如梦窗《高阳台·咏梅》结句‘叶底青圆’,谓梅子也,改‘青’作‘清’,便失本意。又《满江红·过淀山湖》云:‘浪摇晴栋欲飞空’,语极生动,改‘栋’作‘练’,则索然矣。”<sup>[4]</sup>(第 2939 页)后来,杜文澜重刻《宋七家词选》,依宋人用韵协律实际,指出了戈载随意更改之处,并将戈氏臆改之处一一更正过来,使得各家词得以恢复其真实面貌。如果对词律之学一无所知,显然是无法知晓《宋七家词选》对宋词的臆改之病的。

### 三、一个以凄怨幽咽为美的词人群体

淮海词人群在形式上讲求声律之美,在内容上则推重沉郁忧怨之美,他们的创作或抒漂泊沦落之感,或状羁旅行役之苦,或感时态世事之乱,总体上有一种凄怨幽咽的审美特征,反映出在咸丰、同治之际中下层知识分子遭遇乱世时的真实心态和生活情状。

我们认为,生活在咸、同之际的淮海词人群,有点类似于生活雍、乾之际的扬州浙派词人群。他们大多是因为生计的原因,从外地流寓并汇聚到扬州,依附于盐商或盐官,在社会上没有显赫的身分(当然也有金安清、乔松年、杜文澜这样的达官显宦,但数量不多),但他们在艺术上却有较高的审美情趣和品位,仕途上的不顺或个人遭际的不偶成就了他们的文学,使他们的作品里充溢着浓郁的愁苦之声。杜文澜为褚荣槐作序称:“二梅以趺弛之才,久困场屋,复值粤寇之乱,家室流离,抑塞悲郁之感,悉于诗古文词中发之。”吴鼐为蒋春霖作序亦谓:“蒋生鹿潭,承明不遇,作吏淮东,驱俗与居,踞觚灶北。芰衣荷裳,羌修能之自挈,霓旌玉珮,指潜渊以为期。一夕相思,八公招隐。孰海唱之孤愤,答鬼语之幽修。有河上之同歌,吹参差兮自诉。又况帘雨阑珊,念家山于破后;衍波迢递,怅环佩之来迟。鸠媒娈媚,伤如之何!”<sup>[4]</sup>(第 174 页)王之春在谈到《淮海秋笈集》的总体创作特征时说:“都为哀怨之音,盖因兵燹世离,有感而作也。冰署(李肇增)自序有云‘雍门之操,非媚赏于聋俗,车子之奏,期躐佞于温胡,苦调文心,是所望于觚俞之听也’。”<sup>[9]</sup>(卷二)他们或是有个人的“承明不遇”,或是感时事之“魂惊鼙鼓”,故发而为诗文则多“苦调文心”,为“哀怨之音”,为“海唱之孤愤,鬼语之幽修”。

淮海词人群体的“哀音”“苦调”,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其作品中颇多地流露出漂泊流离之苦楚,这一词,人群体大多有着比较普遍的漂泊流转或辗转为官的生活体验。蒋春霖幼时随父到荆门,成人后为求仕奉母游京城,从 31 岁起又流寓到淮南,在苏北东台、泰州等地漂泊达 20 年之久,异乡漂泊之感和怀思故园之叹也伴随着他的一生。如《甘州》(怪西风偏聚断肠人)一词,起首一句从背景说起,在萧瑟秋日,两位“双鬓都华”的断肠人异乡相遇。旧友重逢应该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作者却将它放置在“晴空随叶、吹落平沙、梦次窗纱”的背景里,人为地设置了一种表达凄冷意绪的氛围,而后就是两位天涯沦落人在巴山夜雨中对床夜语。紧接着下来由写景转入抒情,由对眼前之景的描写转向对往日之事的感慨,20 年前两人曾在黄鹤楼上赏月叙情,而今却是同为天涯沦落人——“共飘零千里,燕子尚无家”。最后,词人以“看青衫、写恨入琵琶”、“把悲秋泪,弹上芦花”作结,为全词抹上一层凄怨悲凉的色彩和情调。这是外地词人因生活的原因流寓到扬州,而本籍词人也会因为生计的原因流寓到外地,在他们的作品里同样流溢着这样一种天涯沦落之感。如张安邦《长亭怨慢》:“顿尝尽、飘零情绪。篷背潇潇,漫天寒雨。被冷无眠,五更心碎,向谁诉?倦游词客,禁不起长羁旅。况一叶扁舟,怎裁得离愁千缕。薄暮望湘王,锦

剩有几株疏树。灯昏酒冷,一弹指,故人何处?愿化鹤振翩君前,怕沾湿襟。只羽,纵说与知音,谁识此时心苦。”汪鏊《兰陵王·落叶》:“回头盼乡国,正寒触单衣,声入只履。西风聒耳传消息。望废戍烟远,洞庭波阔,惊心天地换曩昔。感怀到诗客。谁觅径幽僻。念短鬓萧骚,身世狼藉。飘零,宋玉伤秋色。况广漠飞雁,败垣鸣蟀,文章如此。更使我、暗旅魄。”都是如此。而作为出仕扬州的盐官杜文澜,因为长期宦游、羁旅行役、漂泊异乡,免不了也会有流离之苦和乡土之思。比如《壶中天·海陵道中》一词,写他在外乡看到的不是新鲜的景致,却是西风凋敝的凄寒景象——暝鸦、归帆、秋雨、篷窗,这本是乡思者所表现的常见意象,而作者的思绪却跨越千里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念故里天寒,荒桥水长,目断鸳湖路”,还想象家乡父老正在翘首以待游子的归来:“甚日归来还一笑,长伴渔汀鸥鹭”,一般心绪,两样离愁,思乡者和思念游子的父老内心世界都生动地表露出来。

淮海词人群体的“愁声”“苦调”还表现为对动乱时局的关切,他们生活的时代虽曰承明,实为乱世,外有列强数度侵犯,内有农民起义蜂拥而起,特别持续十多年的太平天国战争,让持守正统观念的封建士人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社会危机四伏。最著名的作品是蒋春霖的《台城路》:

惊飞燕子魂无定,荒洲坠如残叶。树影疑人,鸦声幻鬼,欹侧春冰途滑。颓云万迭。又雨击寒沙,乱鸣金铁。似引宵程,隔溪磷火乍明灭。江间奔浪怒涌,断笳时隐隐,相和呜咽。野渡舟危,空村草湿,一饭芦中凄绝。孤城雾结。剩霸网离鸿,怨啼昏月。险梦愁题,杜鹃枝上血。

在作者的笔下,昔日繁华的金陵城变成了一座鬼城,其状金陵烽火流离之情形恍如亲历,亦如诗人自谓“如有鬼声在纸上”,陈廷焯为之评曰:“绘声绘影,字字阴森,绿人毛发,真乃笔端有鬼。”<sup>[11]</sup>(第470页)这类作品还有《甘州》“洪彦先与秦淮女子有桃叶渡江之约,未果而金陵陷,不可寻问颖”、《木兰花慢》“甲寅四月,客自金陵来者,感赋此解”、《虞美人》“金陵失,秦淮女子高蕊陷贼中数月,今春见于东淘,愁蛾篷鬓,不似旧时矣”、《踏莎行》“癸丑三月赋”等,有如杜少陵之《三别》和白太傅之《三吏》,谭献为之评曰:“咏金陵沦陷事,此谓词史。”<sup>[9]</sup>(第246页)。而描绘战争之情状的,在其他词人笔下也时有表现。如张安保《念奴娇》上阕云:“菊花开了又匆匆,轮到重阳佳节。满地平芜斜日冷,何处登临眸豁。古树盘鸦,西风唳雁,战垒人、争说萧条遗迹。至今犹想芳烈。”范凌双《水调歌头》下阕云:“疏蝉唱,孤鹤警,傍高楼苍天。何事沉醉,不死欲何求?那有谪仙游戏,纵使金丹服食,无地可忘忧。回首眺城郭,兵气作云浮。”“战垒人、争说萧条遗迹”、“回首眺城郭,兵气作云浮”等词句,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战争阴云之浓厚和深重。

别说太平军控制下的南京是如此,哪怕是江北的扬州也逃避不了战争的厄运,起义军三次出入扬州城,也把战争的烽火带到了扬州,它如南京一样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芜城”。扬州的今昔变化在这些士大夫的心灵深处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蒋春霖亦有词记其事,其《淡黄柳》曰:

寒枝病叶,惊定痴魂结。小管吹香愁迭迭。写遍残山剩水,都是春风杜鹃血。自离别。

清游更消歇。忍重唱、旧明月。怕伤心、又惹啼莺说。十里平山,梦中曾去,唯有桃花似雪。

周梦庄先生将这首词系于咸丰五年(1855),这恰好描写的是太平军退出扬州城后的芜城景象,这类写扬州“芜城”之情状的词,还有吴熙载作于咸丰三年(1853)的《扬州慢》写自己乱定回家:“道是还家,寻疑重梦,黄埃绕遍归程。认荒园独村,剩几点余青。自歌吹繁华日久,干戈儿戏,民不知兵。念苍生谁问?空教重做芜城。”今昔对比中呈现了乱后扬州城的荒凉景象,言辞之恺切,情感之深沉,实不亚于老杜写安史之乱后的情状。另外,姚正镛作于咸丰六年(1856)的《莺啼序》也是一首写扬州乱后景象的长调,不亚于鲍照的《芜城赋》:“荒城绿芜又满接,昏鸦成阵。嗟雉堞寂寞,灯火不倦,黯黯残暝。有是处,天涯寒食,催归无语魂先凝。莫重提,佳丽扬州,六朝金粉。紫陌楼台,平畴荠麦,且向斜阳认。”其所抒写之感伤情怀又有似姜夔的《扬州慢》,“终古垂杨,犹自青青”一句赋情深沉,大有“明月不知人有恨”之感。

总的来说,无论是写个人之飘零,还是状时势之孔急,淮海词人群都喜欢使用冷色调的语辞,大量运用凄清的意象,营造一种哀感无端的意境。他们个人的遭际和时代的离乱决定,他们的作品——不可能有热烈的情感和思绪,有的只是忧时念乱的情怀和个人在社会动乱环境里的无奈,所以他们在取径上比

较接近白石、草窗一路清幽凄厉的格调,作品里表现出来的亦是一种凄怨幽咽、吞吐不尽的美。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对咸丰、同治时期的淮海词人群有一个大致的认知,这是一群生活在衰世环境里没有显赫社会身分的“寒士”群体,他们的活动地域——扬州的倚声传统让他们走上了注重研讨声律之途,而他们生活的乱世环境——太平天国战争又让他们的创作充满着浓厚的感伤色彩。

### [参 考 文 献]

- [1] 冯其庸. 水云楼诗词辑校[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6.
- [2] 冯 煦. 蕙月词序[J]. 词学季刊, 1935, 2(4).
- [3] 严迪昌. 近代词钞[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
- [4] 杜文澜. 憩园词话[M]. 词话丛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5] 周曾锦. 卧庐词话[M]. 词话丛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6] 谭 献. 篋中词: 卷 5[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6.
- [7] 秦 嶬. 词系[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8] 周梦庄. 蒋鹿潭年谱[M]. 词学: 第 5 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 [9] 王之春. 椒生随笔[M]. 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 [10] 褚荣槐. 田砚斋文集[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0.
- [11] 屈兴国. 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3.
- [12] 黄嫣梨. 清“词史”蒋春霖之生平与著述[C]. 文史十五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13] 饶宗颐. 论清词在词史上之地位[C]. 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 1994.
- [14] 戈 载. 杜文澜. 宋七家词选[M]. 清光绪 11 年(1885)曼陀罗华阁重刻本.
- [15] 凌廷堪. 梅边吹笛谱[M]. 陈乃乾. 清名家词: 第 6 册[C]. 上海: 上海书店, 1985.
- [16] 江 藩. 扁舟载酒词[M]. 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 [17] 顾广圻. 词学丛书序[C]. 思适斋集. 清道光二十年(1849)上海徐氏刻本.
- [18] 杜文澜. 词律校勘记[M]. 上海扫叶山房 1912 年刻本.

(责任编辑 何坤翁)

## On Huaihai Ci Poets Group in Xianfeng and Tongzhi Periods of Qing Dynasty

CHEN Shuiy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CHEN Shuiyun (1964-),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ixue and literature in Ming-Qing.

**Abstract:** The Huai Hai Ci poets association was active in Xianfeng and Tongzhi periods of Qing Dynasty in Yangchow area. It was made up of three parts, namely, the Qing officials, dwellers from other parts of China and the native. They formed the association in Yangchow area. They composed Ci poems in responses to what they received, compiled and published selected or whole Ci poem works of the association members. They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rhythms in their works and regarded the expression of dreary and plaintive feelings as a kind of beauty.

**Key words:** Xianfeng; Tongzhi; Yangchow; association of Ci poets; deliberation of the rhythm